

## 徐光启与西学东渐

● 宋浩杰

当我们展开四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史,就可见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,那就是十六世纪的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。我们若是要探究沟通中西文化的功臣是谁,那就是明朝末年的大科学家徐光启了。徐光启是中国明末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,是明末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位重要人物。

徐光启会通中西文化是出于对中国前途和世界潮流的关切,是为了寻求科学知识,徐光启结识传教士是倾慕传教士的见识和博学,看中的是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,希望的是天主教教义能“补儒易佛”,“可以补益王化,左右儒术,救正佛法”。

1600年,徐光启去南京看望恩师焦竑时,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,当时徐光启已知有利玛窦其人,也已看到利玛窦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,并深为赞叹。就是这张地图,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极大震动,改变了当时国人的天圆地方学说,徐光启也耳目一新,眼界大开,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,从而激发了他放眼世界、了解西方、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。当即徐光启特地连夜拜访利玛窦,两位伟人相见如故,侃侃而谈,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和博学,利玛窦则为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所折服。

1604年春,徐光启到北京,还未参加礼部的会试,就去拜访利玛窦,明确提出要翻译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。1604至1607这三年间,徐光启和利玛窦几乎天天见面,双方的讨论除了天主教义外,其他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,内容涉及数学、水利、天文、历法、火器等,只要利玛窦能教的,而徐光启认为有实用价值的,他都有兴趣学习。

1605年冬和1606年初,徐光启为要翻译《几何原本》,告诉利玛窦:“我知道了这本书,又有你可以请教,我怎能知难而退,让这本书在我手中失传呢?”极力打消利玛窦的重重顾虑,并和利玛窦合作共同翻译《几何原本》这部数学名著。“利氏口译,公则笔之”。1607年春,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译完了《几何原本》前6卷。《几何原本》前6卷出版以后,便成为我国近400年来唯一的定本。

1608年,以《几何原本》为基础,利玛窦口译,徐光启笔录,合译了《测量法义》。徐光启认为,测量之法,扩充其原理就可以用于制水治田,不仅是方便,而且是当务之急。这体现了徐光启重视自然科学、重视数学理论,重视数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。1611年,为了推动修历,徐光启在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的协助下,先后撰写了《浑天图说》《日晷图说》和《夜晷图说》三部著作。

徐光启和利玛窦相识之后,就有共同翻译西方水利专著的计划,后因故搁浅,1610年,利玛窦去世,徐光启返回北京,遂向熊三拔旧事重提,要求完成利玛窦三年前的遗愿,翻译水利著作。经他的一再请求,反复解释,熊三拔终于同意合作译书。《泰西水法》的编写工作自1611年开始,第二年春天完成。徐光启和熊三拔在翻译时没有按照照本直译的翻译常规,而是结合我国原有的水利工具,只选其中适用的或者确实先进的部分译出,并且边译边制器边实验,然后把制器和实验的方法与结果都记录下来。这种翻译方法贵在理论联系实际,《泰西水法》一出版面世就对发展中国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,成为中国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有关农田水利科学的著作。

利玛窦的去世,给徐光启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带来了巨大的困难,当时澳门教会当局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,不准他们从事传播科学的工作。徐光启传播西方科学,不但要面对国内守旧派的反对,还要冲破来自传教士的阻力,但传教士为了能在北京站住脚,也必须把徐光启等人视为政治上的依靠,不便完全拒绝徐光启的要求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徐光启在翻译《几何原本》等书籍外,还对数学、天文等其他领域积极进行研究,后人美誉他为“西学东渐之译祖”。

谨以此文,纪念徐光启诞辰459周年。

## 山芋香飘忆流年

● 顾海鹰

说起山芋,熟悉它的人一定很多。黄皮黄心的,红皮红心的,还有红皮白心的,一个又一个山芋,仿佛扔进了我记忆的湖水,荡起了一阵涟漪。

记得1969年我插队落户到了淮北,又遇上了当地人称为“红薯”的山芋。这时的山芋是我们知青的主食。面对白色的山芋粉,我不知道山芋是怎样变成粉末状的,更不知道该怎样把它做成“饭”。房东马大娘手把手地教我做山芋“粑粑子”:先将山芋粉兑上水,和好,捏一团在手心里,两手转动拍二三次后就成了“粑粑子”,然后将“粑粑子”往烧热的铁锅边沿上一贴,锅中放点水,盖上锅盖,就可以手拉风箱“烧锅”(当地人说烧饭为“烧锅”)了。大约10分钟后,掀开锅盖,将事先调成糊状的山芋糊倒进锅里,搅一搅,再烧开水,山芋“粑粑子”就山芋糊糊的“饭”就算做好了。我逐渐学会了做这样的饭,还能将山芋粉、高粱粉、小麦粉和在一起擀成面条。作为从小吃惯了大米的江南知青来说,当年一日三餐吃杂粮可真是考验。

后来我当兵到过福建、江西,所到之处常常遇到山

芋:部队首长动员报告中说要体谅国家的难处,发扬“南泥湾精神”,训练工作之余开荒种地,种上各种蔬菜,包括山芋。部队食堂蒸屉里的山芋,大多数是部队干部战士的“战绩”,最好吃的要数栗子山芋了,又粉糯又香甜……

1988年我回到上海,在靠近静安寺的南京路上,偶尔能遇到装着一个据说是由柏油桶改成的“烤炉”推车,那是小贩沿街售卖“烘山芋”。我发现婆婆也爱吃烘山芋,每次去看望她时,就买好带去,婆婆俩面对面边吃边“嘎三胡”。后来婆婆得了糖尿病,很馋山芋,我就买小一点的山芋,让她吃点山芋,但把大米饭减少些。婆婆惬意地吃着山芋的情景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1993年4月1日,上海市全面放开粮食价格,“居民购粮证”退出历史舞台,买米不用粮票了,粮店里难觅山芋踪影,人们逐渐开始在小菜场买菜的同时买米,我总忘不了在小菜场买几个山芋。

生活逐渐小康的我们开始关注医学专家的告诫: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,此时的山芋成了健康时尚的标配,当年3分钱一斤的山芋价格居然可以高达10元1斤!名字也更好听啦,有冰糖白蜜薯,有冰淇淋红薯,还有天目山小香薯、秋甜蜜薯等十多种,点击网购即可品尝。



■ 润(摄影)

孙逸

## 绚丽的手套

● 章慧敏

晚饭后,我照例要去小区走两圈。小区里这样的散步客不少,其中的一对老夫妻却格外引人注目。

我下楼散步的频率不算高,但只要走在小区的行道上,总能见到他俩的身影。渐渐的,我发现他们还有不少吸引人眼球的地方:夏天,星星满天的夜里,两位老人也是你一顶蓝色,我一顶红色的遮阳帽端正地戴在头上。冬天,两人除了各戴一顶黄色和红色的绒线帽出现在路灯下,更有趣的是他们的手套。老头儿左绿右红,老太太左红右绿,他们这是把两副手套一拆为二、各戴一只了。

今年的冬天格外冷,我的散步成了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的摆设,偶然也会想起两位老人,想到他们持续数年的快步走路,不过,我没看到他们。

不知为什么,没有他俩的粉墨登场,总让我觉得风景中少了色彩和动力。开始我还以为老人们是担心风寒侵袭,直到上个星期,连续阴雨后我们终于看到久违的阳光,而我也见到了久违的老人。两位老人依然各自戴着黄色和红色的绒线帽,不同的是,他们不再健步如飞。老太扶着老头在绿草地上缓缓迈步,一步、两步……老头儿与其说在走路,不如说是在挪步。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,老太的额头上汗津津的,看得出她在用力。

曾给小区带来风景的“老顽童”又回来了,他们老了病了,却仍在坚持创造生命力。因为生命就像他们戴的手套,充满了绚烂的活力!

## 我的三枚印章

● 李之音

近日,“心心相印——中国印文化”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开幕,展出很多珍贵的印章。我也珍藏着三枚印章。

第一枚是读小学时的,论质地,完全谈不上是印章。长方形的扁扁小木块,顶端贴有一片橡皮材料,上面是本人的姓名。小朋友每人都有一个,用于在作业本上敲名字。老师好像也有,有的老师也会用在品德评语后面。毕业后,小印章就留在身边。母亲也是教师,她有一枚,后来买卖房子时母亲就用这枚章,还让售楼人员惊讶不已,仿佛看到出土文物。

大学毕业,踏上工作岗位。一天和父亲散步,看到路旁一家很小的国营刻章店,好像叫“长江刻字厂”。父亲说“你工作了,要不刻一枚正规的印章吧。”父亲带着我挑了石头,选了字体,我选了篆书。这一刻,我才知道原来印章有讲究的。刻好后,我觉得那个“之”字一点都不像,问店员,又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,见识短浅。大约十年后我买房,第一次郑重地用这枚黑色石头的章,很是得意。有意思的是,售楼小伙看着合同上的我的印章,看着那个“之”,疑惑地问我“是这个字?”“是你的章?”我暗自好笑。

两枚印章如今都放在一个小盒子里,有时看看,很开

桂花苑 刊头书法 江妙春

心,也很怀念。

二十年过去,有缘结交一位漂亮的小朋友,她刚进我校工作。尽管我俩相差近二十岁,但不妨碍很快成为忘年交。相识第二年,我的生日当天,小丫头拿着一只绿色小盒子说:“李老师,生日快乐!”我打开一看,一枚精致的印章。我略犹豫一下,还是问道:“不会是你刻的吧!”得到的当然是肯定的回答。令人惊讶啊,这么一个时尚小姑娘居然会这手艺。随着交往加深,我对她的赞叹、佩服与日俱增。她爱读书,而且是历史、音训、文字、传记方面的,还有圈画批注;她认识不少真正有文化有层次的人,所谓人以群分啊;当然她也爱吃爱玩爱美。从她身上,我再次觉得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判断时尚的年轻人,否则只能说明你老了。

这第三枚印章,我一直放在书桌抽屉里,没舍得用。

最后要说的是,那天我接过小丫头送我的印章时,我还专门看了看那个篆体“之”字。呀,真的是一样的。